

[MIRROR] 025

ORLANDO FIGES

# III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 娜塔莎之舞： 俄罗斯文化史

作者\_ [英] 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_ 郭丹杰 曾小楚

[英] 奥兰多·费吉斯 著 郭丹杰 曾小楚 译

娜塔莎之舞：  
俄罗斯文化史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By Orlando Figes**

Copyright © Orlando Figes 200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 [ 进 ] 21-2017-68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 (英) 奥兰多·费吉斯著；曾小楚，郭丹杰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3

ISBN 978-7-220-10669-9

I. ①娜… II. ①奥… ②曾… ③郭… III. ①文化史—俄罗斯

IV. ①K5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0915号

出版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http://www.scpph.com>

责任编辑：张 丹 李洪烈

特邀编辑：吴晓斌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印刷

开本：965mm × 635mm 1/16

印张：54.25 字数：715千字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139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MIRROR]

理想国译丛

Imaginat

025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 读

## “娜塔莎起舞”与俄罗斯文化之婆娑丽影

张建华

### 一、从书名说开去

作为奥兰多·费吉斯 (Orlando Figes) 同行和拥趸 (fans), 几乎他的每部著作我都曾翻阅过。我钦佩他出神入化的俄文阅读和理解能力, 钦佩他在俄国历史、文学、文化和哲学诸多领域的纵横捭阖, 钦佩他将史学的求实与文学的想象有机结合, 但更为钦佩的是他为每部著作的巧思命名, 因为书名即是书的灵魂。

《耳语者: 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2007) 之所以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并被翻译成 20 余种文字, “耳语者”的书名无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Whisperers 意为“窃窃私语的人”, 语出自美国恐怖和奇幻小说作家洛夫克拉夫特 (H. P. Lovecraft, 1890—1937) 在 1930 年完成的科幻小说《暗夜呢喃》(*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 是其以外星种族米-戈 (Mi-Go) 为主题的克苏鲁神话系列的一种。但是, 在《耳语者》中, 作者叙述的却不是“科幻故事”或“传奇

神话”，而是讲述了1924—1953年间苏联社会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备受后人的毁誉和臧否。在这里，“耳语者”之所以“不敢高声语”，所担心的不是“恐惊天上人”，而是不能惊动“身边人”、“周围人”，甚至是“枕边人”，尤其是不敢惊动无处不在、无影无形和无所不能的“老大哥”（Big Brother）。

奥兰多·费吉斯于2012年出版的《寄给我你的问候：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Just Send Me Word: A True History of Love and Survival in the Gulag*）<sup>[1]</sup>，是以“纪念协会”提供的真实信件为素材，写出的感人至深的真实历史和故事。“寄给我你的问候”（Just Send Me Word）语出俄苏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1966）在1946年创作的著名诗篇《在梦里》（*Во Сне*）的英译 *In Dream*，内有诗句：“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相遇 / 你只有在午夜时分 / 透过星星寄给我你的问候。”<sup>[2]</sup>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离别的14年里，在“古拉格”的严密监视下通信1300多封，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寄给我你的问候”是他们坚守爱情和热爱生命的真实写照。

本书书名《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则典出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煌煌巨著《战争与和平》的经典片断。对此，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的“导言”里已做了详细交代。<sup>[3]</sup>

“娜塔莎”（Natasha），一个多么清丽的俄国姑娘的名字，它与另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卡秋莎”（Katyusha）一样，是极为流行的俄国（苏联）女性的名字，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和20世纪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更为常见。“娜塔莎”是源自拉丁语的“娜塔利亚”（Natalia）的爱称，意为“诞生”。“卡秋莎”是源自希腊语的“叶卡捷琳娜”的爱称，意为“纯洁”。

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是一个灵魂人物，她出身名门，



深受欧洲古典贵族教育，是一个单纯、快乐、活泼和善良的少女。在接受战争洗礼之后，她逐渐成熟，最终成为志向高远和意志坚定的“新女性”。她是托尔斯泰道德理想和“新人”的化身。

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中解释说：“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与托尔斯泰展示娜塔莎之舞同样的方式来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特殊经历或具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展现和理解。”

“娜塔莎之舞”揭开了俄罗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创伤。

在彼得大帝以“野蛮”方式治理俄国的“野蛮”，试图强行将俄国航船拖上“欧化”（“西化”）轨道之前，在俄国盛行的是多神教文化+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蒙古-鞑靼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东方式统治和彼得大帝欧化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反差。未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以及20世纪初产生的“欧亚主义派”思潮即源于彼得大帝改革，准确地说源于社会分裂状态下的“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

“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它的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俄国最基层的组织村社，其成员的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

“文明”俄罗斯是欧化的模式，是彼得大帝苦心打造的理想国，主要存在于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它的文化形象是庄园、沙龙、舞会、鼻烟、意大利歌剧。其通用语言是舶来品——法语或德语。

“本土”俄罗斯与“文明”俄罗斯对抗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际上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进而导致俄罗斯社会分裂的悲剧。因此，当含着金钥匙出生，并在全真的贵族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娜塔莎”偶然地在“农民大叔”的林

中小屋里翩翩起舞时，“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液”，一下子就撕开了俄罗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百年创伤。

冯维津（1744—1792）在18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了俄罗斯的东西方属性这个“文化命题”。半个世纪之后，恰达耶夫（1794—1856）在《哲学书简》中感叹：“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sup>[4]</sup>

在本书中，奥兰多·费吉斯给出了答案：“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有着分裂的人格。他的思维一分为二。表面上，他有意识地按照约定俗成的欧洲惯习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又为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所影响。”

“娜塔莎之舞”代表了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性格”<sup>[5]</sup>和“民族心理”（mentality）。

20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认为日耳曼是男人的民族，俄罗斯只能是女人的民族。然而，更有学者称俄罗斯是一个性格刚烈的民族，尚武、善战、扩张是它藏在骨子里的东西。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天然地孕育于俄国这方水土。俄国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横跨欧亚大陆，拥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一望无际的平原、四通八达的河流。这块土地特别厚爱俄罗斯人，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用俄罗斯人的话说就是在他们的地底下埋藏着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物质。大自然的慷慨给了俄罗斯人一无际涯的空间、丰富的资源，也给了俄罗斯人高大魁伟的身躯，宽广豁达的胸怀，慷慨、豪爽而忧郁的性格，坚韧、顽强的毅力，超强的天赋和创造力。

大名鼎鼎的“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担任普鲁士驻俄大使。有一次他在彼得堡郊外风雪交加的

原始森林里迷路了，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听到俄国马车夫嘴里反复地说着一个词“Ничего”（音译：尼切沃），并且示意他不要紧张。最后他们终于安全地走出了森林，俾斯麦也因此永远记住了马车夫说的那个词，并且弄懂了它的含义：“没关系”。这个词让他深刻理解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奥兰多·费吉斯用了较大的篇幅描写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并赞颂了十二月党人背后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妻子。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这些同样出身贵族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还专门修改了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恼羞成怒的沙皇下令：凡决定跟随丈夫流放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永世不得返回家乡，并永久取消贵族身份与特权。跟随丈夫或爱人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们义薄云天的壮举，浇开了西伯利亚荒蛮原野上绚烂的爱情之花。然后当1887年有位记者找到十二月党人妻子中最后辞世的达夫多娃时，她仅轻声地说：“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sup>[6]</sup>

历史的时钟在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敲响，但“娜塔莎之舞”并没有止步，尽管这位旧时代的贵族小姐需要花大力气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新政权致力建立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产生了些许的政治与时空的错位。

“十月革命”与其称为短暂的和疾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如将其视为长时段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因为与旧制度的政治决裂往往形式剧烈而过程简捷，而与旧文化的文化决裂乃至新文化建构虽然波澜不惊但背后却暗流暗结并且过程复杂。在十月革命的背景之下，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以贵族精

英文化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又不同于泛滥于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全新文化，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色领袖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1917年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就建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强力部门”。列宁在晚年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并且“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sup>[7]</sup>

这种红色文化被冠之以“苏维埃文化”。“红色苏联”“红色政权”“红色领袖”“红军”“红海军”，这一个个鲜活的政治和历史符号，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著名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在路经美国有感而著的《苏联护照》中自豪地写道：“看吧 / 羡慕吧 / 我是苏联的公民。”

“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上通用的民族概念。“苏维埃文化”是较短时间形成的主观的动员型文化，非长时期渐进形成的客观的进化型文化，它是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苏联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双向作用而形成的。“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因为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广大的苏联人民，而非仅限于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苏联人民是此种文化真正的和最有发言权的体验者与享受者，因此“苏维埃文化”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中写道：“在塑造苏维埃新人的过程中，艺术家也起到核心的作用。是斯大林在1932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著名的短语，把艺术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新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塑造就是“文化革命”

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著名历史学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色教授学院首任院长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院士在1928年宣布：“我们已经进入需要苏维埃政权所承认的学者的时代……现在我们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者。”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我国知识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更……我们苏联的知识界，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界。”<sup>[8]</sup>它意味着，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与“苏维埃文化”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

在冷战时代和反共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奥兰多·费吉斯并没有否定“苏维埃文化”或者将其污名化，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史德”与“史识”将“苏维埃文化”视为俄国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其在文学、戏剧、建筑、音乐、电影和日常文化等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以及“娜塔莎们”在跨入新时代后经历的痛苦与欢乐。奥兰多·费吉斯将其称之为“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Russia Through the Soviet Lens）。

## 二、俄国文化史的宿命与使命

“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叙事体例，也曾经是俄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帝俄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米留科夫（1859—1943）就著有两卷本的《俄国文化史纲》并闻名于世。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苏维埃政权的“宏大革命叙事”的背景下，以革命情怀和大众文化为本质的新文化——“苏维埃文化”，取代了原来以精英意识和贵族文化为本质的旧文化——俄罗斯文化。“文化史”在苏联史学体系下也渐渐式微，其地位被政治史和经济史取代。

1993年初，就是苏联解体尚未完全落幕之时，美国政治学

家和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 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毫不客气地将俄罗斯民族、国家和文化列为“顽劣”之列, 从而使俄罗斯学术界连发“余震”, 并极大地提升了对“文化”、“文明”和“文明史观”的关注。

亨廷顿于 1995 年应邀到俄罗斯作学术访问,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发表演讲和辩论。《社会科学》与《当代》《自由思想》《国际生活》《哲学问题》《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等杂志设立“圆桌会议”专栏, 大量刊发俄罗斯学者相关文章。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玛尔莱娜·拉吕埃勒 (Marlène Laruelle) 在《文化学——俄罗斯新的“老套思想”》中评论道: “尽管教科书的作者们未必赞同亨廷顿提出的世界未来冲突论的观点, 但他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念, 即两极化之后的世界只有通过‘文明论’的图解才能解释: 西方文化区或曰‘大西洋主义’文化区与‘斯拉夫—东正教’空间相对峙, 而‘穆斯林世界’将不得不在同西方或者俄罗斯结盟间做出选择。”<sup>[9]</sup>

在如此现实和紧迫的背景下, 古老的“文化史”在俄罗斯复兴, 并且还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文化学”。

在史学研究领域, 文化史成为当代俄罗斯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大学里普遍设立俄国文化史教研室, 开设不同时期的俄国文化史课程, 出版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与文明史的著作。<sup>[10]</sup> 研究领域涉及了许多全新的或从前较少涉及的内容, 如贵族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贵族生活史、决斗史、首都和外省文化史、婚俗史、农民史、商人史、政治文化史、性别史、城市生活史等。

俄罗斯颇有影响的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娃, 在已十余次再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的序言中曾申明: “首先是历史经验问题以及人们生活的历史经验问题的重要性, 在任何

时期从来没有像 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那样紧迫。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甚至不光是让学者，而且还使各种各样的公民着迷。到处都有关于俄国历史的争论：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室里、工厂车间乃至厨房里。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正是国家历史，以及对它的评价在人们中间划分出了要比对今天的实际问题评价严重得多的鸿沟……必须帮助青年大学生认识俄罗斯社会的历史特点，帮助他们形成远离国内战争综合症和苏联时代所养成的陈规陋习的世界观。”她宣布：“本教科书的任务是给出俄国历史道路的完整观点，从文明角度展现不同社会水平的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厘清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资料运用于比较分析之中，将俄国史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历史做比较。”<sup>[11]</sup>

“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是当前俄罗斯学术界另一个更大的亮点。<sup>[12]</sup>许多大学的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纷纷设立文化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变身”为“文化学教研室”的突出现象。在俄罗斯颇受欢迎的《俄罗斯学》的作者沙波瓦洛夫在该书的序言里开宗明义提出问题：“你们的传统是什么？你们的根在哪里？你们在哪里生活？怎样获得食物？怎样管理国家？怎样解决棘手的权力和自由问题？如何划分民族集团和社会阶层？如何对待深刻的、自古即有的众多问题？你们从生到死一生的路标如何转换？你们是如何相爱、结婚、生育和抚育自己的孩子的？你们是如何工作、娱乐和体现自己在艺术与文学方面的创造精神的？为保护文明免于衰落采取了什么样的联系和组织原则？你们崇拜什么样的上帝？什么样的信仰影响你并给你以力量？你们承认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信念在驱使你？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影响你的生活？什么样的幻想和神话激励着你们？什么样的威胁使你们无助？什么能给你们以战斗的勇气？什么样的混乱现象使你们恐惧懈怠？什么样的共同感觉使你们

联合为一个整体？”<sup>[13]</sup>

1990年开始出版《文化·传统·教育年鉴》，1996年开始出版《文化学》杂志。199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第一次制订了经过大学5年学习取得文化学专业所必需的标准。随后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副博士学位，2000年又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文明与世界文明、性别与婚姻、民族性与国家性、俄国与西方、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普世主义等。在许多院校，文化学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成为跨学科和专业的人文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俄罗斯高校的文化学课程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约100学时，名称多为“文化史”“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俄国文化史”及“文化史及理论”。文化史和文化学课程被俄罗斯教育界视为帮助大中学生树立世界观、价值观、爱国主义观、国际主义观的重要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学术界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有重点和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欧美学者关于俄罗斯文化与俄国文化史的研究的同时，奥兰多·费吉斯每部著作的出版几乎都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关注。《耳语者》英文版于2007年出版后，俄罗斯“王朝”基金会立即与他签署了俄文版权转让协议，将决定由俄罗斯阿斯达（ACT）出版集团旗下的考鲁斯（Corpus）出版社出版，但终因奥兰多·费吉斯在2010年卷入对俄罗斯政府的批评而未果，但这足以说明，谨慎并孤傲的俄罗斯学术界对奥兰多·费吉斯著作的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价值判断。

### 三、奥兰多·费吉斯：其人其作其风

奥兰多·费吉斯实在是一个备受争议和特立独行的职业历史学家。



奥兰多·费吉斯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 (<http://www.orlandofiges.com/>), 上列他的全部著作及档案文献, 供读者无偿或有偿阅读和使用。他在自我介绍栏目中写有如下文字: “奥兰多·费吉斯是伦敦大学伯贝克 (Birkbeck) 学院历史学教授。他于 1959 年出生于伦敦。他以 ‘双星第一’ (Double-Starred First) 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84 年至 1999 年, 他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历史学讲师。”

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灿若群星的英国史学大师级人物中, 许多人如阿克顿 (Lord Acton, 1834—1902)、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伯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卡尔 (Edward Carr, 1892—1982)、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1917—2012) 以及身兼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 都极为关注 “Russia” (“USSR”) 这个 “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因此, 这位 1959 年出生的奥兰多·费吉斯实在是英国史学界名副其实的 “晚辈后生”。

在英国这个史学大国里, 奥兰多·费吉斯虽然资历尚浅, 但他的史学前辈和同辈相比, 在他身上又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专业倾向和叙史风格:

第一, 与绝大多数英国史学家不同, 奥兰多·费吉斯的学术兴趣专注俄国 (苏联), 并以俄国史和苏联史的研究为专守志业。自 1989 年出版《俄国农民与内战: 伏尔加河畔的农村革命, 1917—1921》(*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 之后, 他一口气完成了《人民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 1996)、《俄国革命解说: 1917 年的语言与符号》(*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1999, 与鲍里斯·克洛尼茨基合著)、《娜塔莎之舞》、《耳语者》、《克里米亚》(*Crimea*, 2010)、《古拉格之恋》和 2014 年最